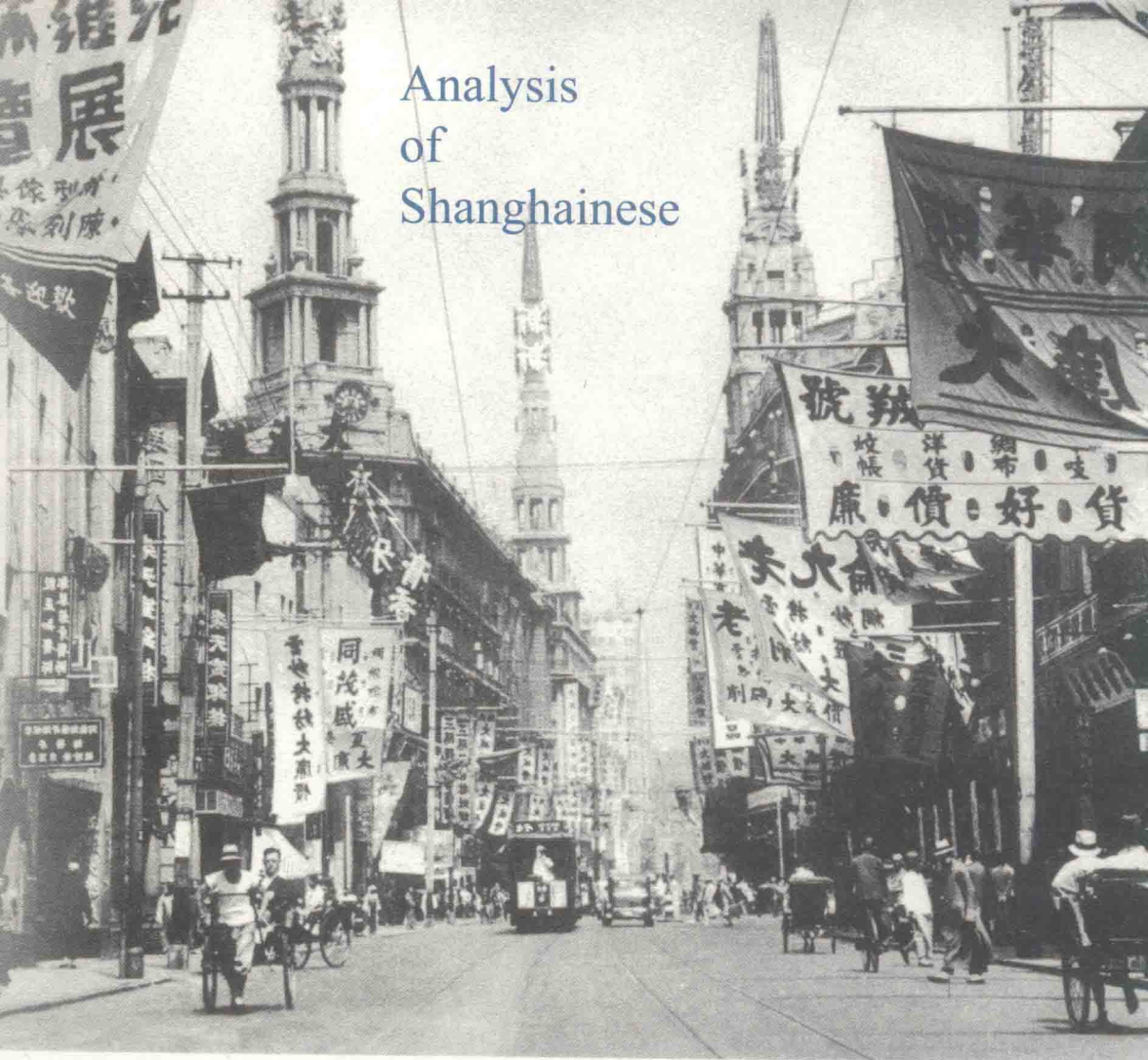




Analysis of Shanghainese

上海史研究的领军者

解读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群体

破解上海人海纳百川的“基因密码”

熊月之

著

解析 上海人

上海人 解析

熊月之

著

Analysis
of
Shanghainese



上海教育出版社
SHANGHAI EDUCATIONAL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海人解析 / 熊月之著. —上海: 上海教育出版社, 2019.3

ISBN 978-7-5444-8935-5

I. ①上… II. ①熊… III. ①人物研究-上海 IV.

①K820.8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9)第 008357 号



责任编辑 储德天

责任校对 鲁 好

封面设计 陆 弦

封面摄影作品来源 Visual Shanghai

SHANGHAIREN JIEXI

上海人解析

熊月之 著

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

官 网 www.seph.com.cn

地 址 上海永福路 123 号

邮 编 200031

印 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×1000 1/16 印张 19.75 插页 4

字 数 325 千字

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44-8935-5/K·0055

定 价 59.80 元

如发现质量问题, 读者可向本社调换 电话: 021-64377165

前言

上海人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中比较特殊的群体,是常说常新的对象,是每一本中国区域文化著作都会述及的话题,余秋雨、杨东平、易中天等学者都有过专门论述。笔者自20世纪80年代参与上海史研究以来,时常会涉及这一话题。我时常被问及:“你是上海人吗?”也时常会自问:“我是上海人吗?”答案永远是两可的。我一直对此题目有着浓厚的兴趣,陆续写过一些或长或短的文字。收入本书的,便是这些文字的衰辑。

全书分为六个部分:

第一部分,“上海人形成及其认同”,是关于上海人研究的总的思考与讨论,包括“上海人”概念辨析、近代上海移民社会形成、“上海人”名称溯源、上海居民主客界限消解、上海人身份认同原因与双重认同、上海人行为方式与审美情趣、上海话与上海认同等。

第二部分,“政治与经济人物”,涉及对象有郑观应、李平书、孙中山、钮永建、穆藕初、黄炎培与宋庆龄。

第三部分,“文化与社会人物”,涉及对象有张焕纶、钟天纬、王培孙与孙曜东。

第四部分,“人物群体”,涉及明末松江士人、近代上海儒商、近代上海贫民、晚清上海妇女、晚清上海文人、民初上海遗老、民国时期上海音乐人、“七君子”、近代上海广东人、近代上海香山人、近代上海珠海人与浦东人。

第五部分,“近代外侨”,述及近代上海外侨对上海城市的认同,还有傅兰雅与雷士德。

人物分类只是粗略意义上的,因为有些人很难截然分归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某一类,不少人是两者或三者、四者兼而有之。粗略分类主要是为了便于阅读。外侨是其中

比较特殊的群体,但他们在这个城市居留既久,关系亦深,对于上海也各有认知与情感。将此类文字收录进来,亦体现近代上海城市特色。

最后一部分,也是最后一篇,带有总括性质,集中讨论上海居民特性与城市精神。

这些文章多为序言或书评,故篇幅多短。也有两篇较长:一是开头一篇《上海人形成及其认同》,3万多字,这是涵盖上海人问题的综合论述;二是最后一篇《上海居民特性与城市精神》,也有3万多字。

熊月之

于复旦大学上海史国际研究中心

2018年8月10日

目录

上海人形成及其认同 / 1

政治与经济人物

一代通人郑观应 / 35

论李平书 / 44

孙中山与上海 / 56

钮永建的精神世界 / 63

论穆藕初在近代中国的文化意义 / 69

黄炎培与“新场党狱” / 84

略论黄炎培为人处世之道 / 88

近代上海城市对于宋庆龄的意义 / 98

文化与社会人物

近代教育先驱张焕纶 / 109

钟天纬深通西学 / 119

王培孙与南洋中学 / 124

“老上海”孙曜东的口述史价值 / 130

人物群体

明末松江士人的实学思想 / 135

近代上海儒商的特有风采 / 138

近代上海城市对于贫民的意义 /	141
晚清上海女权主义实践与理论 /	159
略论晚清上海新型文化人的产生与汇聚 /	170
辛亥鼎革与租界寓公 /	182
上海音乐人与抗日救亡 /	187
“七君子”与时代精神 /	190
近代上海广东人 /	195
上海香山人与香山文化 /	198
上海珠海人短论九篇 /	212
浦东人与浦东同乡会 /	221
浦东人与浦东史 /	224

近代外侨

略论近代外侨对上海城市的认同 /	231
傅兰雅与上海 /	248
英商雷士德的大爱情怀 /	262
上海居民特性与城市精神 /	265

上海人形成及其认同

现代中国,上海人早已成为一个具有明显文化特征的社会群体,与北京人、广东人、湖南人、四川人、山东人等并提。所不同的是,上海人形成自身文化特征的历史,远不及广东人、山东人、湖南人那么悠久,而只是近百年的事。

分析上海人,需分清两类不同内涵的“上海人”概念。一类是纯粹籍贯意义上的上海人,另一类是在行为方式、审美情趣等方面自具特色的上海人。

开埠以前的几百年中,上海人口大体来自四个方面:一是随着上海陆地的逐渐形成,从太湖流域顺势东迁的,这是上海地区的最早居民。二是在北宋、南宋之际,随着宋王朝首都南迁杭州,从北方中原一带迁移而来的,如华亭董氏、张氏、唐氏,吴淞曹氏,青浦黄氏,上海下砂瞿氏、鹤坡里谈氏,松江锦溪曹氏,其先世都是从开封南迁上海地区的。金山枫泾之孟氏,为孟子后裔,也因这次战乱而南来。徐光启先世来自中州,抗清名人陈子龙的先世来自颍川,黄渡李澄川来自洛阳。三是在元末农民起义时,因避战乱而从江南、江北一带逃到上海的。四是随着明清时期上海经济的繁荣,海上贸易的发达,从江苏、浙江、广东、福建等地移居上海的。他们在此一代一代繁衍生息,自然成为具有上海籍贯的本地人。

在开埠以前,上海人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特征。他们或植棉,或制盐,或种粮,或捕鱼,或经商,文化上受苏州影响较大。那时具有独特行为方式、审美情趣等文化意义上的上海人还没有出世,即使某人自称上海人,或提到某人是上海人,例如说徐光启是上海人,董其昌是上海人,陆深是上海人,也只有籍贯上的意义。

当然,细分起来,在近代以前,上海地区人也是有自己文化特征的群体,不过,范围、等级不一样。假如那时说到上海人,也就像今天说到青浦人、奉贤人一样,是在省、府以下的县级而论。所以,明清人常在“上海”前面冠以“江苏”或“松江”等更高一级的地名以标明其所在范围。

一、移民社会

开埠以后,特别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,大量移民涌入,上海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

变化。

1843年上海开埠时,城市人口约20万,1900年超过100万,1910年129万,1915年201万,1930年314万,1949年初达546万。一百多年中增加了20多倍。上海人口急速膨胀,短短一百年中,上海从一个普通的滨海县城,一跃而成全国第一大都市。进入上海的国内移民,从方式上看,多属零散、自发、非组织性的,不是有组织的集团性移民。在一个多世纪中,共有三次移民潮涌入上海。第一次是太平天国期间,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江、浙一带战事频仍,大批难民涌入上海,从1855到1865年,上海人口一下子净增11万。第二次是抗日战争期间,上海两租界人口增加78万。第三次是解放战争期间,上海人口增加208万。^①

除了因战乱、灾荒而来沪避难者,更多的是受上海城市吸引力而来沪创业者。自19世纪70年代以后,随着上海轮船招商局、机器织布局等洋务企业的创办,随着缫丝、棉纺、面粉等实业的兴办,上海吸纳人口的能力大为增强,上海周边来上海谋生、发展的人迅速增多。诚如《申报》所述:

至近十年来,各项工艺振兴,局厂林立,远近谋食者,于于而来,在本地之人相识较多,谋生更易,无论男妇老幼,均不忧无噉饭处。然而利之所在,往往不能无害,即如点石、同文诸局,创办石印图籍后,其时他局接踵而起,无虑十余家,于是大江南北,浙水东西,凡操三寸不律之士,多呼朋挈眷旅食于兹,户籍陡增,数以万千计。乃自各局相继闭歇,而此辈流落于兹者,颇不乏人。其始不远千里而来,谋食固易,迨乎生机既寂,旅况多艰,则以为悔莫能追,而不知祸福倚伏,天下事大抵如斯也。中国妇女,不出闺门,惟供中馈,并白缝纫之事,富家或所不习,贫户则人人能之,松沪擅棉花之利,小家妇女尤谙纺织。近岁吴淞江以北,丝纱各项厂局方兴未艾,附郭及近乡妇女之尚此为生者,或业缫丝,或业拣茧,或业织市,或业纺纱,朝而往暮而归,其人亦以数千计。虽大半乱头粗服,而其中小家碧玉,挈妹呼姨,娉婷婀娜而来。^②

上海城市无与伦比的集聚功能,吸引着来自各地形形色色的人,为各色人等施展才华,寻找生路,提供了广阔的天地。你有钱在内地不安全么,到上海来,投资工厂,买房

^① 邹依仁:《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,第3—5页。

^② 《论沪上各厂女工宜设善法防护》,《申报》1897年1月2日。

地产,或进行股票交易。你念不好四书五经、做不来八股文么,不要紧,只要你能读好洋文,照样能找到一份薪水优厚的职位。你会画画吗?行,每天涂他几幅,照样丰衣足食。能处方治病,能搭台唱戏,能跑街算账、算命打卦、耍拳卖药,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。即使你目不识丁,也不要紧,只要你能吃苦,肯出力,拉黄包车,当码头工,也能混一碗饭吃。

于是,难计其数的逃难者,投资者,冒险者,躲债者,亡命者,寻找出路者,追求理想者,有文化的,没文化的,富翁,穷汉,红男,绿女,政客,流氓,都向上海涌来。上海成了容纳五湖四海各色人等的人的海洋。

上海真是一个万花筒。……只要是人,这里无不应有尽有,而且还要进一步,这里有的不单是各种各色的人,同时还有各种各色的人所构成的各色各样的区域、商店、总会、客栈、咖啡馆和他们特殊的风俗习惯、日用百物。^①

这么多的外地移民涌入上海,使得客籍即非上海籍人口,远远多于上海本地人口。据上海自1885年以后历年的人口统计,公共租界非上海籍的人口通常占80%以上,华界非上海籍的人口通常占75%以上。在1950年1月的统计中,其时已无租界,非上海籍人口占85%,上海籍人口仅占15%。^②

近代上海大部分时间里,一市三治,有公共租界、法租界与华界三个行政实体分别治理这个城市的某一区域,没有一个独立的诸如民政局之类的行政部门负责接待、安置源源不绝的各地移民。移民来沪时所依赖的路径是投亲靠友,依赖的是亲缘、地缘与业缘;来沪以后所依赖的依然是由亲缘、地缘与业缘支撑起来的会馆、公所。

会馆、公所在近代以前的上海业已存在,但是,近代以后数量更多,规模更大,功能也更加多样。据潘君祥等人研究,上海历年全部会馆、公所总数为402个。其中,同乡团体共53个,建立在从顺治到道光年间的11个,从咸丰到宣统年间的26个(包括清末年份不明的2个),民国年间的16个(包括年份不明的10个);同业团体为349个,占总数的86.8%,建立在从康熙到道光年间的27个,从咸丰到宣统年间的150个(包括清末年份不明的8个)。同业团体的高占有率,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工商性质。^③

① [英]爱狄密勒:《上海——冒险家的乐园》,上海文化出版社1956年版,第29页。

② 邹依仁:《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》,第112页。

③ 潘君祥等:《上海会馆公所分类统计名录》,载《都会遗踪》第二辑,学林出版社2011年版。

当然,这 402 个会馆、公所是历年存在的总数,并非每一个都始终存在。从 1909 到 1930 年,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上海指南》,对上海会馆、公所的名称与地址有具体记录(表 1)。据此记录,上海会馆、公所 1909 年 57 个,1922 年 228 个,1930 年 256 个,数量为历年最高。

表 1 《上海指南》记录上海会馆、公所数量

年 份	会 馆	公 所	会馆、公所合计
1909	18	39	57
1912	28	78	106
1922	53	175	228
1926	58	181	239
1930	63	193	256

注:资料来源为《上海指南》,上海商务印书馆 1909、1912、1922、1926、1930 年版。

表 1 中这一数量,与潘君祥等人统计的数量有所不同,但反映的上海会馆、公所特点没有变化,即:第一,上海会馆、公所全部是工商性组织,没有科考性的,这与北京、南京、福州、广州等地相比,是上海的一个显著的特点。第二,从晚清到民国,上海无论会馆还是公所,都呈快速递增趋势,20 世纪 30 年代达到高峰,这与上海城市发展、移民人口增加成正比例关系。第三,无论哪一时段,上海同业性公所数量远远大于同乡性会馆数量。^①

上海会馆、公所在整合华人社会、沟通官府与民众等方面,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。近代上海的行政空间被分为三块,即公共租界、法租界与华界,华界又被分隔为南市、闸北、沪西与浦东。三个行政实体在市政、治安、税收、交通、法律、教育、卫生等方面均互不统属,各自为政。华人分处于各个区域之中。由于会馆与公所是不分华界还是租界的,靠着这两个系统的综合作用,华人社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整合。

比如,在两次著名的四明公所事件中,投身于其中的宁波人,不只是居住在法租界的,而是全上海的。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中,为反对法租界强占公所,上海的宁波人举行罢工罢市。1898 年 7 月 17 日上午十时,公所总董方继善在安仁里鸣钟集会,数百名

① 尽管会馆、公所内涵并没有严格的区别,且不少时候是通用的,但从总体而言,“会馆主要是地域性的社会团体,公所主要是行业性的社会团体”。参见范金民:《清代江南会馆公所的功能性质》,《清史研究》1999 年第 2 期。

宁波人应声涌至,共约罢工罢市。轮船上的宁波籍水手一律上岸,被西人雇用的宁波人一律辞职,宁波人开设的店铺一律停闭。宁波商人比较密集的地区是南市,南市的相关商店一律罢市。某宁波人在新马路所开的中华茶楼未遵约罢市,被其他宁波人侦知,群起将玻璃窗捣碎。在美租界,虹口一洗衣作坊主宁波人张东生,未遵令停工,遭本作坊宁波人李存友等群起痛殴。

再比如,1897年上海爆发小车工人抗捐事件。这次事件以前,上海并没有一个小车工人组织,也没有小车公所。抗捐事起,为了解决车夫因加捐而带来的困难,在道台、县令的授意下,成立了一个通瀛公所。这是一个以地区命名的同业公所,也是上海第一个以小车工人为主的公所。通瀛公所成立后,承担起管理车夫的职能。他们在小车工人中设立车头12人,管车寓数百家,“各车寓乃各保所寓车夫,自安生业,无作非为,到加捐时不敢违抗生事”^①。从此,散漫无归的车夫被公所组织起来,形成一个颇具势力的群体。

会馆、公所一个重要的职能是为所属成员排解难事、代理各类事务。山东会馆在规条中就规定,“同乡之游于沪上者,或客居、或路过,如有应代理之事,必先由本帮司董为之理处,如事可了,毋庸集议。倘本帮司董不清理,再行传单齐集公议”;同时会馆规条还规定,同乡中若有人被欺负或无端受牵累,会馆亦会参与共同具禀保释事项。^②许多会馆都有类似功能。1902年耶松船厂的四名广东木工,因事被租界当局逮捕。有关公所董事就此进行斡旋,先后与木工首领、会审公廨、外国船厂老板接触,并向道台寻求帮助,最终使他们获释。1905年12月,上海人大闹会审公堂案件中,因为被诬拐卖人口的黎黄氏是广东籍已故官员黎廷钰的妻子,所以,广肇公所、潮州会馆在联络广东人方面,起了带头与关键作用。1923年,宁波人乐志华在一英国人家里为佣,被主人诬陷偷钱740英镑,关进牢房,被巡捕打得遍体鳞伤,结果屈打成招。事为张元济所知,他通过宁波同乡组织呼吁社会援助,向法院提起诉讼。官司打了五个月,冤情终于得到昭雪,六名肇事巡捕被革职查办。

上海会馆、公所是沟通官府与民众的第三领域。近代上海城市中许多事务,是以前中国城市中所未曾有的。诸如道路桥梁建设、市政管理、医疗卫生、文化教育、垃圾处

① 《通瀛公所董事张寿怀、沈嵩龄、章定勋、应朝纲致书濮来德先生阁下》,上海档案馆藏公共租界总务处档案,1897年小车工人抗捐事件。U1-5-73,第65页。

② 《山东至道堂微言录》,引自张忠民:《清代上海会馆公所及其在地方事务中的作用》,《史林》1999年第2期。

理、水质污染、火灾消防、疾病防治、居民纠纷、中外交涉,或者是以前不曾遇到的,或者是以前虽有但没有这么繁难、严重、急迫的。上海在 1843 年以前,作为县一级的机构,官员人数很少,仅设知县一人,总管一县之治理。下置县丞、主簿、典史各一人,分掌粮马、征税、户籍、缉捕、狱囚诸职。上海县在城外设黄浦、吴淞两巡检司,各置巡检一人,负责该区治安。县城学宫内设教谕一人,掌县学之管理及生员之训教。县内还设有阴阳学训术、医学训科、僧会司僧会、道会司道会各一人,分掌星占、医药、佛教、道教诸事,品秩微末,且无俸禄。整个政府机构极为简单。这样的制度安排,政府官员既少,管事官员尤少,经费更是奇缺,完全不能适应对于上海这样的近代城市的管理需要。其结果,导致在政府与居民之间,会馆、公所这样的非政府、非民间的第三领域的发展。^①从顺治到道光年间,上海已有会馆、公所 38 个。它们从官府那里获得房产、冢地免征课税的特权。近代上海会馆、公所功能大为扩展,从祭祀神明、联络乡谊、办理丧葬、迁运棺材、按照原籍习俗安排节庆活动等,扩展到兴办各种慈善事业、教育事业,对旅沪同乡实施救助,对受灾家乡实施紧急救助,沟通移民与政府之间的联系,在协助地方政府约束外地来沪移民方面,在税收和维持地方秩序方面,实际上起了“半政府”的作用。

会馆、公所之中,公所在第三领域的功能尤为明显。诚如张忠民所述,同业性质的公所,其宗旨之一就是协调或者规范同业的内部事务。比如,布业公所的主要职能,便包括辨别牌号以杜影射、刊发规条以整尺梢等^②。洋货公所振华堂订有同业规条 8 则,旧花业公所列有同业章程 10 条,米行公所仁谷堂立有规条 8 条,乌木公所、售花公所、典业公所、震巽洋木业公所、茶业公馆各订有若干条规,分别对同业的营业规模、从业人员的工价,同业营业中的当值估算,新典开设同行营业中的买卖放账、往来交易,做出了明确的规定。公所的这一功能,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地方政府对工商业事务的管理缺位。地方政府有鉴于此,也就越来越多地依赖和利用这一功能。光绪年间,上海县衙示文棉花买卖不得买空卖空,便要求花业公所详加查察。在日常生活中,一般的同业交易规则基本上是由会馆、公所公议,并由会馆、公所监督执行;当规则遭到破坏时,通常也先由会馆公所出面调停处理。只有当事情波及面过大,由一般的内部“投词”变成了必须对簿公堂的“讼案”,会馆、公所无权、无力处理时,才会上交地方政府处置。^③近代上

① “第三领域”系黄宗智所创用,见黄宗智:《中国的“公共领域”与“市民社会”?——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》,载邓正来等编:《国家与社会: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》,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9 年版。

② 《布业先辈姓氏碑》,载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:《上海碑刻资料选辑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,第 204 页。

③ 张忠民:《清代上海会馆公所及其在地方事务中的作用》,《史林》1999 年第 2 期。

海公所远多于会馆,社会组织如此发达,正是城市人口高度集聚、分工细密、行业众多,而政府在管理方面多有缺位,导致行业内部的自我管理功能强化的表现。

在会馆、公所对于华人社会的整合及沟通官府与民间作用方面,一个很典型的事例是上海民众在“五四”运动中的作用。众所周知,“五四”运动的爆发,与德国人在青岛的权益有关。本来,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,其先前在青岛侵占的权益应归还中国,不料,巴黎和会却要将其转给日本,这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。“五四”运动的怒火首先从首都北京燃起,其最后形成燎原之势,迫使北洋政府拒签和约,并罢免曹汝霖、陆宗輿与章宗祥三人,很关键的因素是上海的罢课、罢工、罢市的“三罢”斗争。其中,冲在前面发挥关键作用的,是山东人。山东会馆是上海资格最老的会馆之一,也是凝聚力最强的会馆之一。还在4月底,巴黎和会开始不久,山东会馆就召开过两次会议通报情况,致电北洋政府,要求捍卫主权、物归原主、据理力争。5月4日北京学生上街游行后,山东会馆立即响应,5月5日在霞飞路举行紧急会议,决定召开国民大会。5月7日,由山东同乡会等57个团体发起、有五六千人参加的国民大会在西门外公共体育场召开,一致要求释放学生、惩办国贼、拒签和约。此后,旅沪山东人积极联络全国各地山东籍的军官,包括湖北督军王占元、湖北暂编第一师师长孙传芳、北洋陆军第三师师长吴佩孚、淞沪护军使卢永祥,请他们支持爱国运动。6月5日以后,“三罢”斗争在上海如火如荼展开,上海的山东人走在前面,积极参与。其时,卢永祥是上海华界最高军政长官,正是在他的默许、支持下,上海学生没有遭受残酷镇压。上海各界要求罢免曹、陆、章的要求得以传递到北洋政府。“五四”运动中,上海山东人的斗争表现出时间长、范围广、方法多、决心强四个特点,^①其联系网络就是山东会馆、山东同乡会等组织。

二、“上海人”名称溯源

“上海人”之名不知始于何时。

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上海报刊上,已有“上海人”一词出现,但那仍然是籍贯或一般上海居民上的意义。比如,1869年,《中国教会新报》介绍波斯国聘请英国人制造铁舰事,便解释说,“波斯国即上海人称白头国是也”^②。1872年《申报》报道:“虹口设有二烟馆,一为汕头人所开,一为上海人所开。二店常有银钱交往,上海人欠汕头人钱一

^① 郭绪印:《老上海的同乡团体》,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,第714—715页。

^② 《学铁舰》,《中国教会新报》1869年第24期,第11页。

千五百文,久而未还,汕头人屡次讨索,辄约缓期。数日前,上海人肩钱三千文,过汕头人之门,汕头人望见,遂向其追索旧债。”^①这种用法以后一直有。比如,1910年《申报》报道上海城厢地方自治公所当选董事名单,便标明各自的籍贯,“李钟珏平书,年五十八岁,三十一票,上海人”,“顾履桂馨一,年四十一岁,二十二票,上海人”。当选者也有非上海籍人,包括同属于江苏省而不属于上海县的青浦人、吴县人、嘉定人,以及不属于江苏省的浙江人,也一一标明其籍贯,如“王震一亭,年四十四岁,二十八票,浙江人”。^②

不是纯粹从籍贯或地方居民意义上,而是从行为方式、审美情趣一类文化意义上使用“上海人”概念的,在迄今所见到的资料中,最早的一条是李鸿章在1900年与李平书的谈话:“君是上海人,当与洋人习,何不度德、不量力乃尔!”^③那时,李平书在广东一个县做官,领导乡民与洋人斗争,李鸿章教训他措置失当。在李鸿章的潜台词中,上海人当是通晓事理的明白人。这条资料,系李平书日后回忆所述,并非当时对话实录。

稍后,在1904年的《警钟日报》上,编者已以“吾上海人”的口气说话。比如,这年6月,恰值日俄战争期间,《警钟日报》发表一篇题为《新上海》的社说,提出上海是“上海人之上海”的命题:

上海何以丑?上海者,固上海人之上海,而非白哲人公有之上海也。上海人不能爱惜此天然形势,碎裂上海地图,抛弃祖父白骨,失寸失尺,渐渐干没入白人手,宜其低头于白人势力圈下,上海人之主权,从此扫地。上海人妻孥之堕落,永无了期。嗟嗟,风月主人,宛其死矣,迷离妖梦,尚未醒乎?怪哉上海人,执几重奴券,似有余荣;受无数痛鞭,居然不觉。丑哉上海人,虽倾西江之水,洗不尽上海之污点。^④

这里所使用的“上海人”,隐含着有共同利益、共同权利、共同价值的群体,是与“白哲人”相对应的群体,显然是指当时居住在上海的所有中国人,而不仅仅是拥有上海县籍贯的居民。以黄人、黄种人与白人、白种人作为对应之词,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

① 《译通文馆西字新闻》,《申报》1872年8月31日。

② 《各省筹办地方自治》,《申报》1910年2月22日。

③ 李平书:《李平书七十自叙》,见李平书等:《李平书七十自叙·藕初五十自述·王晓籁述录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,第45页。

④ 《新上海》,《警钟日报》1904年6月26日。

国知识界习惯用法,从宋恕、章太炎到邓实、孙中山等都有使用甚至论述。^①这一思路与其时日本流行的大亚细亚主义影响有关,但又有明显区别。日本人从荒尾精到近卫笃磨所倡导的“大亚细亚主义”,旨在征韩、征华、统治亚洲,与欧洲争雄,而中国知识界使用这一词汇,则旨在振奋民气,抵抗欧美列强侵略。^②

此后几年,到辛亥前后,在报刊书籍中,“上海人”不但是一个频繁出现的词汇,且与北京人、汉口人、南京人并提。1910年,《新闻报》称:“人皆谓上海为风气开通之地,而上海人亦遂以开通风气自负。”^③1911年,报刊上已出现将上海人作为插科打诨取笑对象的情况。《申报》上一篇题为《付之一笑》的短文写道:

天气炎热,常啖水果,忽思得水果与上海人之比较,录之如左:

上海人像西瓜,走热路;上海人像西瓜子,头尖身滑;上海人像核桃壳,硬而厚;上海人像桃子,十桃九蛀;上海人像柑子,金玉其外,败絮其中;上海人像樱桃,穿不得;上海人像桂圆,外面极圆中心极黑;上海人像苦瓜,看得吃不得;上海人像藕,空心;上海人像橘子,一轧就坏;上海人像石榴,看了无辩的话,笑得掀牙露齿,合不拢嘴来。^④

由此可见,从行为方式、审美情趣一类文化意义上使用“上海人”概念的大体上始于20世纪初年。

三、主客界限消解

重视籍贯是中国一大传统。所谓“籍”,即簿书,是国家形成以后,出于控制和动员人力、物力的目的,登记统治区内人口的文书;所谓“贯”,是指居住地。籍与贯,分别反映个人在国家簿书上登录的居住地及其实际居住地两种情况。^⑤传统社会,“安土重

① 比如,1897年张焕纶为南洋公学学生所作《警醒歌》,其第一章即从不同肤色民族的不同命运切入,对学生进行爱国宣传,内云:“警警警,黑种奴,红种姆,黄种酣眠鼾未竟。毋倚冰作山,勿饮酖作酝,焚屋漏舟乐未央,八百兆人,瞥眼同一弃。醒醒醒。”见沈恩孚《张焕纶先生传略》,《中华教育界》第24卷第10期。再如,1900年,宋恕在赠友人诗中写到“茫茫禹域难黄主,赫赫姬宗不白奴”,自注:“禹域白人势强,黄人万难自主。”见宋恕:《赠冈本韦庵先生》,载《宋恕集》下册,中华书局1993年版,第842页。

② 参见戚其章:《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探析——兼与盛邦和先生商榷》,《历史研究》2004年第3期。

③ 《沪事谈屑》,《新闻报》1910年1月4日。

④ 无辩:《付之一笑》,《申报》1911年8月24日,第35版。

⑤ 包伟民、魏峰:《宋人籍贯观念述论》,《浙江大学学报(人文社会科学版)》2007年第1期。

迁”“父母在，不远游”的观念，在祖宗坟墓所在地奉侍亲长的孝道，科举考试中对应试士子籍贯的重视与录取名额的按地域分配，登科士人可以提携、惠及宗族桑梓的影响，对于地方官员任职资格中籍贯回避的规定，以及对于流动人口的管理，诸如此类，都强化了整个社会的籍贯意识。因此，任何一个移民较多的城市，都会形成土著与客籍的对应关系。上海亦然。

大量事实表明，在开埠以后的四五十年里，上海居民还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土著与客籍的对应关系，土著与客籍各自明白自己的身份。1853 到 1855 年，上海爆发了著名的小刀会起义。小刀会队伍的成员主要是在沪的广东人与福建人。上海地方政府与本地人一般都将此视为广东人、福建人的事。小刀会起义失败后，上海地方当局也不认为那是上海人的事情，而只追究在上海的福建人、广东人的责任，所以，清政府采取的惩办小刀会的十条措施中，有三条是明确针对寓居在上海的福建人、广东人的。这三条是：慎选闽、广会馆董事；递籍安插闽、广游民；闽、广商民会馆一律迁出城外。^① 清政府对闽、广籍人士采取了严厉的惩治措施，“永禁闽、广人入城居住。所有城内从前建造会馆公产，并私置房府，一概入官，变抵充公”^②。上海地方政府对待土著与客籍的居住地是有所区别的，城内是本地居民的地盘，客籍只能住到城外。1874 年，上海爆发了四明公所事件，在沪宁波人与法租界当局发生冲突，上海当地人谁也不认为那是上海本地人的事情，而只认为那是寓沪宁波人的事情。1893 年 11 月，上海公共租界举行上海开埠 50 周年盛大庆祝活动，上海华人踊跃参加，但他们打的旗帜是“广帮”“宁帮”之类，他们的身份并不是代表整个上海的华人，而是上海的广东人或上海的宁波人。

19 世纪中后期的外来移民，主要居住在两租界与城厢外面，尤以公共租界为多。他们的聚集方式、生活特点，与城厢内本地居民有明显不同，与中国其他内地城镇也很不相同。1883、1887 年，《申报》上各有一篇文章论述这一特点。1883 年的文章称：

他处无论城市乡镇，或客籍寄居，或出居土著，皆未有如洋场之杂，假如一家迁移，其于进屋之日，不论屋之为典为赁，例必先向左右邻自通乡贯，间或邀集邻居数家，设席相待，有内眷者则并请邻居内眷，其有不办酒者，则以一糕一果，遍惠诸邻，邻人受此，亦必殷然垂询其家世事业，如此则十室之地，彼此互知，如欲连环具结，

① 叶廷眷、俞樾纂：同治《上海县志》，引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：《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，第 961 页。

②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：《吴煦档案选编》第 4 辑，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，第 83 页。